

良善刑法的道德标准及其实现途径

谢青松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寻求一种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善刑法始终是立法者和法学研究者共同的目标。通过对中西思想史的梳理和现行刑法的批判性反思,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和价值分析的方法,指出判断良善刑法的核心标准是道德价值,即良善刑法以人道为底线道德理念,以正义为核心道德理念,以和谐为最高道德理念。同时提出良善刑法的具体实现途径,良善刑法作为刑法的应然状态,必将成为中国刑事法律的终极追求。

关键词:良法;人道;正义;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8)04-0070-06

作为法律体系中最基本、最古老的部门法,刑法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总是与惩罚、残酷等词语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近代以前,刑法规范通常极端严厉且具有相当大的任意性,刑罚体系十分残酷,肉刑、酷刑、死刑非常盛行,刑罚执行方式也特别残酷。中国古代的墨、劓、刖、宫、大辟,西方的绞刑、电刑,均让人不寒而栗。但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刑法观念的变迁,刑法也逐渐告别野蛮和愚昧,开始走向宽容和人道。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来,一些思想家和法学家对刑法的道德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影响后世的思想和见解。如今,刑罚的目的在于保护和扩大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正义与和谐,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实际上,在一个文明的法治社会,法律的权威和神圣并不仅仅来源于其强制和威慑,而是更多地源于其所体现的永恒、普遍的道德价值。在众多的法律中,刑法的生杀予夺特点,使得它本身就缺乏一种亲和力,很难让人接近。因此,要使刑法为人们所普遍遵守,要建立起公众对刑法的信仰,唯一的途径就是寻求一种良善的刑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背景下,寻求一种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善刑法更是成为立法者和法学研究者共同的目标。

一、良善刑法的提出及其意义

良善刑法的实质就是良法。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良法问题。他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此即法治是良法之治,良法是指那些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它们必须本身合于正义,合于促进整个城邦的幸福和善德。自此,对良法的讨论就成为西方法哲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重大主题。

在西方古代、中世纪与近代,良法理论一直与自然法学派有着不解之缘。自然法学家认为,良法是符合理性法或自然法的法律;而恶法则非理性或不正义的法律,恶法由于不具有必要的道德效力而不具备法律上的效力,即恶法非法。进入中世纪以后,欧洲自然法思想被宗教神学理论家所继承,良法

收稿日期:2008-06-12

作者简介:谢青松(1977-),男,湖南耒阳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

理论也在宗教神学思想体系中存在并发展。中世纪的大神学家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均表述过恶法非法的思想。在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如格劳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建立了完整、系统的自然法理论,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恶法非法的观点,但他们的理论观点至今仍然是西方法哲学体系中良法理论的基础。与自然法学派相对立的是分析法学派,他们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认为法律无论好坏,也无论其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人们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不服从的权利。他们提出了一个与自然法学派论完全相对立的命题,即恶法亦法。

二战以后,在审判纳粹战犯的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引发了一场关于“法律与道德”、“良法与恶法”的长期辩论。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勃鲁赫在二战以前一直是实证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在晚年痛苦地经历了纳粹的法西斯统治和二战给德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之后,拉德勃鲁赫深刻地认识到自然法思想所体现的永恒正义理念及其作为实在法基础的必要性。拉德勃鲁赫的理论观点被德国联邦法院所采纳,并且在二战后的一些案件中得到适用。

在当代西方法学界,法学家在反思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局限性的浪潮之中,力图扬弃与超越传统的良法标准,重构良法的价值理论。当代新自然法学派的良法思想超越了古典自然法学家们的良法范畴,其良法理论更加关注现实的法制生活,着眼于对现实法律的批判性思考;他们除了承认内容(实体)上的良法外,还认为良法应该有程序上的特定内涵,从而对良法标准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富勒、德沃金、罗尔斯等。富勒将法律的道德准则分为“内在的道德”与“外在的道德”。罗尔斯认为,“正义”可以分为“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德沃金则认为,法律概念不仅包括法律规则,而且包括法律原则,而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道德原则。另外,当代新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承认“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即一种法律制度之所以成为真正有效的法律制度所必须具备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条件。

在中国,对良法的探求也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尽管没有明确提出良法之概念,但决不乏追寻良法之思考与实践。周公的“明德慎罚”、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孟子的“仁政”(“善政”)、荀子的“隆礼重法”、道家的“道法自然”、法家的“法与时

移”、“令顺民心”以及“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等思想,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良法的部分内涵和标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义利之辩”,实质上也可理解为良法及其衡量标准之争。特别是在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刑事立法推行“以礼入律”,将许多道德规范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讲求“原心论罪”,法官审判的依据不仅仅是法律规范,更重要的还要考察人心之善恶,把人心作为确定行为性质的标准,道德规范往往成为比法律条文更具效力的判案依据;在执法过程中则推行“秋冬行刑”、“留养承祀”等具有浓烈道德色彩的制度。深受儒家礼法思想影响的中华法系甚至因此而被称为伦理法。可见,在中国古代,对良法的追求不仅仅止于一种理论上的探索,而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实践精神。

当代中国学界已有不少法学家开始关注和研究良法理论,并出现了一批颇为可观的学术成果,如李龙教授的《良法论》、汪进元教授的《良宪论》等,但是对于良法的涵义,学术界依然众说纷纭,并无定论。著名法学家李步云教授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良法”就是“真、善、美”的法。“真”是指法的内容合规律性,即符合事物性质,反映时代精神,适应客观条件。“善”是指法的价值合目的性,即体现人类正义,实现人民利益,促进社会进步。“美”是指法的形式合科学性,即结构严谨合理、体系和谐协调、语言规范统一^[2]。

良法理论在刑法中的实现,即为良善刑法。所谓良善刑法(或称作“优良刑法”、“良性刑法”),在笔者看来,就是指刑法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刑法规范表述清晰准确、逻辑缜密、结构合理、体系完备,同时在制定和实施程序上具有正当性,在内容上无悖于人类共同的道德情感之刑法。良善刑法之所以必要和值得我们欲求,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第一,良善刑法由于内涵并传承着人类法治文明的理念,具有坚实的道义基础,因此能够获得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尊重和认同。在几千年的人类法制历史实践中,法律的某些优越品性和功能已凝结为某种较为稳定的价值理念,并积淀于各国的法律文化之中,成为各国人民追求理想法律的价值目标,成为法律发展、完善的灵魂和动力。尽管从全球范围来看,价值多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否认的事实和基本特征,但是人类文明中某些具有普适价值的理念,如正义与和谐,则是所有文明类型和社会模式都不可缺失的基本理念,如同具有正常理性的人不会

拒绝幸福一样,良好的法律制度也不应当抛弃正义等价值理念。法律本身承载着崇高的道德价值使命,反映了人们的道德诉求;不表达人们道德价值追求的法律不可能得到长久的贯彻和落实,必然为人们所抛弃。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法律实际上就是尊重人们通过集体积累所达成的道德价值选择。良善刑法由于内涵并传承着人类法治文明的普适性价值理念,具有坚实的道义基础,因此它本身就是好的法律,值得并能够获得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尊重和认同,这也是良善刑法之所以值得我们孜孜以求的深层原因。

第二,依法治国实质上是“良法”治国。作为法律体系中最重要部门法之一,刑法是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良善刑法也是良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法治作为人类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智慧结晶,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并成为现代各国追求政治文明的普遍要求。“依法治国”的一个理想假设,即良法之存在。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基础,也是实现法治的先决条件。“良法问题与依法治国有着紧密的联系,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的命运与前途,是中国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或者可以这样讲,依法治国实质上是良法治国……只有良法才能体现与保障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只有良法才能管理好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只有良法才能全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实现社会正义”^[3]。刑法是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部门法之一,应当是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严厉的部门法,在法治社会中往往被认为是良法标准的底线。因此,良善刑法是“良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第三,良善刑法是构筑和谐社会之基石,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法律保障。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基本、最古老的部门法,其设立原本就是体现了维护和谐社会之旨意,并构筑了和谐社会之基石。从刀耕火种到网络时代,贯穿人类文明几千年,刑法一直对社会关系进行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调节,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稳定器,充当着维护社会之和谐的基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日益增多,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对我们党和国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适时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和谐社

会被界定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设和谐社会要旨,就是要求调动各个领域的力量,解决或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使各种社会关系整体上达到和谐共处的状态。而只有良善的刑法才能够促进社会达到和谐,使社会冲突不断得以化解,社会秩序井然和谐、有条不紊,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良善刑法的道德标准

良善刑法究竟如何可能?也就是说,判断和衡量良善刑法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难以确证,却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认为,良善刑法应当符合三个标准:第一,技术标准。刑法规范表述清晰准确、逻辑缜密、结构合理、体系完备,同时在制定和实施程序上具备正当性,即它是符合一定的技术标准,具有完美形式的法律体系;第二,功利标准。刑法的过程必须具有效率,刑罚配置应当尽可能合理有效,以最小的刑罚投入产生最大的刑罚效益,即预防和阻止犯罪的发生;第三,道德标准。良善刑法除了法律体系在客观上被人们接受以外,同时必须在价值判断上是正当的,即法律本身必须符合人们心中永恒、普遍的道德原则或道德理念。判断良法的核心标准就在于它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实际上,刑法本身承载着一定的道德价值,反映人们的道德诉求,标示出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刑法的道德理念,就是给具体的刑法确立一个起码的道德标准,使良善刑法成为可能。良善刑法以人道为底线道德理念;以正义为核心道德理念;以和谐为最高道德理念。

(一) 人道——良善刑法的底线道德理念

作为道德理念之“人道”,亦称人道主义或人道精神,在启蒙主义时期成为资产阶级最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之一。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创举都应当服务于人的幸福生活,即使人类社会的存在也仍然是基于人的需要。因此,人是万物的价值尺度,是评价社会以及万物的标准,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和尊严。康德由此提出普遍的“道德律令”——“你需要这样行动: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目的,总不能把它只当作工具”^[4]。康德的人道主义思想后来成为现代刑罚人道主义原则的重要渊源之一。与康德同时代的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也站在人道主义

立场上对历史上的严刑酷刑作了猛烈的抨击。如今,刑罚人道主义作为现代刑法得以建立的基础性理念之一,已为当代法治国家所广泛认可和遵循,并成为现代刑法的底线道德理念。刑罚人道主义具有以下三重涵义。第一,保护与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自尊和基本人权。犯罪嫌疑人因为犯罪受国家刑罚处罚,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其人格自尊和所有权利,这就要求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不能凌辱其人格自尊,不能剥夺其剩余的那部分公民权利。第二,禁止把犯罪嫌疑人当作实现刑罚目的的工具。刑罚人道主义作为一项原则和一种道德理念,它既不是一种手段,也不是一种功利目的,而是具有终极性的意义,它是判断功利目的与手段是否合理及正义的尺度。犯罪嫌疑人因触犯刑律而承担罪责,但作为道德意义上独立自主的人格主体依然存在,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并不该作为手段成为警戒社会公众的工具和范本。第三,禁止使用残酷而蔑视人权的刑罚手段。1948年12月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可见,反酷刑已经成为考察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刑罚人道主义的一项基本标准。

(二) 正义——良善刑法的核心道德理念

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理念和价值理想,也是构建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正如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和有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有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5]。

在刑法中,正义是最核心的道德理念,它引导我们对刑法制度存在的根基进行理性的反思。正义在现代刑法中主要体现为平等、公平和正当。第一,平等。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明确提出了刑法的平等性原则,使刑法平等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为各国刑法所确立。刑法平等包括立法平等、司法平等两个方面。第二,公平。

公平是正义的应有之义,罗尔斯将其正义论称之为“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此即正义原则是在一种公平的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的,或者说,社会合作条件是在公平的条件下为所有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他们所达到的是公平的契约,所产生的也是公平的结果,即条件公平、契约公平、结果公平。正义的原则是在公平的条件下产生的,它本身就是公平的契约,而它的实行将使社会趋向最大可能的公平。由此可见,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公平是核心。在刑法中,公平主要是指刑罚分配的合理性。第三,正当。刑法尽管是社会利益的保护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但刑法目的之实现,必须借助限制和剥夺公民的财产,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等手段,刑法生杀予夺之特性决定了它在本质上为一种“必要的恶”。因此,我们不得不经常推敲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的正当性应该是刑法哲学考察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6]。迄今为止,对刑法的正当性问题探讨中最有影响的有报应正当论、预防正当论、报应与预防一体论三种学说。

(三) 和谐——良善刑法的最高道德理念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观。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为贵”为基本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和谐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积淀,贯穿于中华民族整个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与“协和万邦”等价值取向也为我们解决当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提供了历史的智慧和现实的参照。和谐作为一种道德理念,在本质上是利益关系之协调一致、互不冲突,是“道德化的利益关系”。这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前提。社会规范制度是协调利益关系,整合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整合机制和行为规范体系。刑法就是通过限制乃至剥夺人的重要权益来调整与保护社会利益关系,使社会利益关系趋于和谐一致。另外,和谐作为道德理念,还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无处不在体现并追求这一理念,如古人的天道原则,要求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法律的制定、修改和执行等)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而要遵循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之佳境。当然,当代刑法对于破坏自然环境之行为

所做出的刑罚反映则是刑法对人与自然关系在立法上的直接调整,这无疑保证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可以说,良善刑法的终极价值,就在于通过限制过度膨胀的种种人欲,以保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秩序不被打破,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追求一种自然秩序的和谐。在刑法中,和谐的道德理念主要体现在刑法价值追求之中。在良善刑法中,刑法诸价值要素之间的关系,必然体现为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和谐的道德理念也体现在刑法运行过程中。对于刑法的和谐道德理念,笔者已有专文论说,因此本文就不再赘述^[7]。

三、良善刑法的实现途径

通过对良善刑法衡量标准的探讨,可知刑法的良好品质主要来自其本身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即“人道”、“正义”与“和谐”之道德理念。那么,良法在刑法领域中究竟如何实现?也就是说,良善刑法怎样由理想变为现实?这也许是更复杂、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法律伦理学的研究不仅要“考量法律中应当蕴涵何种价值理性和道德理想”,而且要“考虑法的道德理想是怎样一步步地具体化为立法原则与法律规范的”^[8]。如果良善刑法的构想不具有可操作性,不能对现实的法律生活有所裨益,那么就会沦为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主观遐想,从而失去意义。因此,探讨良善刑法的实践机制成为必要。笔者认为,良善刑法之实现,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设立“刑事法律伦理委员会”,创制良善之刑法。将理想状态的和谐之刑法、正义之刑法变为现实的关键,就在于立法。创制良善之刑法,要不断提高立法技术,重视立法程序的正当性;为保证刑事法律规范本身在道德价值上彼此不相抵牾,也不与社会道德发生严重冲突,可借鉴其他领域,如医院、科研机构、企业设立伦理委员会的做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刑事法律伦理委员会”,待经验和时机成熟后,再推广至民事、行政等法律领域。“刑事法律伦理委员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其一,对现行刑事法律规范进行伦理审查。对于现行刑法规范(包括司法解释)中可能有悖于伦理道德的条文进行逐一审查,必要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同时在刑事立法或修改过程中对于确实有悖于伦理道德的法律条文可以行使否决权。其二,指导刑事立法工作。“刑事法律伦理委员会”主要由

受过系统的专业知识训练的伦理学专家组成,由他们对法律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难题做出专业性的分析和论证,特别是对社会发展所产生重大的具有道德歧义的现实问题,如安乐死、试管婴儿、体外受精、精子库、网络犯罪、人工授精、见死不救、婚内强奸和性贿赂等道德与法律的难题进行伦理学研究,从而指导刑事立法工作,有效地区分道德与法律的边界,以尽量减少法律的伦理困境之出现。其三,必要时对立法工作者举行道德教育培训、宣传和提供伦理咨询服务。伦理委员会可定期对刑事立法工作者进行系统的伦理学理论培训,并适时地对其进行道德宣传教育,解答他们的相关伦理困惑,提供适当的伦理学意见或建议。“刑事法律伦理委员会”的组成可借鉴国外相关伦理委员会的组成原则,主要由受过伦理学专业训练又具有一定法律修养的伦理学学者组成,同时为了保证成员背景的多样性,有必要吸纳一部分其他专业的学者和适当人数的普通百姓(他们可以完全没有学术背景但应当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参加,以弥补伦理学学者的专业局限,提供不同角度的意见,从而保证意见符合普通民众的道德常识。当然,在伦理委员会的组建过程中,性别和民族的比例也是应当被考虑到的。总之,“刑事法律伦理委员会”设立的宗旨就是尽可能地从源头(立法阶段)上阻断道德与法律冲突之出现,使良善刑法成为可能。

第二,培养公正廉明的法官,确保刑事司法公正之实现。“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也不会自动产生效能,而是需要高素质、公正廉洁及理性的司法人员来操作。良善刑法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人格状态,取决于法官队伍的素质水平。因此,培养德才兼备、公正廉明的法官成为良善刑法在刑事司法中得以实现之关键所在。由于任何一件由法官自由裁决的案件,都将无可避免地受到法官伦理道德状况的影响,在该法官的道德标准下处理,那么法官的道德品质就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刑事司法公正的实现(无论是对程序正义的实现,还是对实体正义的实现)。只有具备良好道德品质的法官才能正确理解法律的内在精神、价值目标及其规范要求,忠于事实真相,并对当事人的有关行为、动机进行正确、合理的司法评定,从而分清是非,确定法律责任的有无、大小及其归属,执着地追求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公正这一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鉴于法官伦理道德对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和目前中国法官道德水平的整体状况,必须重视法官道德素质

的培养,加强对司法人员的道德教育,加强对法官的道德制度性约束,建立和完善对法官的道德测评和奖惩机制,将道德列为考评的重要依据,从而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道德品质,使之能够真正担负起维护司法公正的神圣职责,成为社会的“良心”,从而保证良善刑法在司法中的实现。

第三,贯彻人道主义执法理念,探索死刑替代措施。刑事执法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正义,它既应当承载惩恶扬善的严厉性,又必须尊重和維護人类共通的情感。因此,树立人道之执法理念,把人的理性和尊严放在重要地位,保护与尊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是刑事法律的基本伦理要求。另外,慎重适用死刑也是良善刑法在执法中的必然体现。就目前中国而言,首先要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格与合法权益,禁止酷刑和有辱犯罪嫌疑人人格的刑罚和对待方式;其次,要慎重适用死刑,积极探索死刑的替代措施。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废除死刑制度还有一定的难度,但废除死刑必然是中国刑罚制度完善所应当努力的方向。死缓制度作为中国特有的刑罚制度,对于少杀慎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考虑以死刑缓期执行代替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即罪当处死但缓期两年执行,两年之内如果不再犯新罪则改判为无期徒刑;或严格的无期徒刑、附赔偿的长期自由刑等其他刑罚处罚措施^[9],以利于切实贯彻实施“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总之,中国司法领域亟待现行刑法的框架内,树立轻刑化观念,尽量减少死刑的适用,同时加强死刑替代措施的探索,以逐渐过渡到废除死刑。

第四,确立公众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包含着社会对法律的理性推崇,寄托着公众对法律的终极关切。法律如果不被信仰则会退化为僵死的教条和毫无意义的摆设。确立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使公众对刑法产生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良善刑法在守法中的集中体现,也是良法所追求的必然结果^[10]。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体现了法律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如果没有道义和德行的支持,法律本身就缺乏了人们必须服从的合法性根据;也只有通过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法律才能真正确立和维持其至上性和最高权威,获得普遍有效的遵守。在中国现阶段,不尊重法律、不信任法律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有法不依”的状况也较为严重,法律常常遭遇执行的尴尬。这些现象的出现有着诸多的因素,但肯定与国人法律信仰的淡漠乃至缺失是有关的,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

我们的法律本身还不够优良。事实上,如果能够创制出既能够最大限度地符合人性和尊重人的情感的正义之刑法,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能够秉公执法的优秀法官,同时在执法过程中贯彻人道主义的理念,尽可能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和合法权益,那么我们的法律必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应有的权威和尊严,获得广泛的道德支持和人们出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仰,也唯有如此,良善刑法才能真正由“理想”变为“现实”。

四、结 语

法律作为人类实践理性的产物,其终极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正义与和谐。人类法律发展的历史不断启示我们,只有“良法”方能承担起这一重要的使命。作为刑法的应然状态,良善刑法是立法者和法学研究者对法律的美好期待,更是人类理性的必然选择。当然,良善刑法只能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状态,绝对良善的刑法是不存在的,相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刑法,今天的刑法规范就是良善刑法,但是相对于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状态而言,则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理性的觉醒,刑法的理想状态是能够被无限地趋近的。对良善刑法的期待和追求,也是推动刑事法律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良善刑法由于传承着人类法治文明的普适性价值理念,具有坚实的道义基础,符合人类情感的诉求,因此,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保障,还必将成为中国刑事法律的终极追求。

参考文献:

- [1] 亚里斯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 [2] 李步云,赵 迅. 什么是良法[J]. 法学研究,2005(6):125-135.
- [3] 李 龙. 良法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 [4] 康 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5] 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何包纲,廖申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6] 陈兴良. 走向哲学的刑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 [7] 谢青松,吉 凯. 论刑法的“和谐”道德理念[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7(8):6-11.

(下转第82页)

oped and social economic system has experienced innovation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hina. JIANG Ze-min's contribution is signific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theory.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literature, as well as applying theories to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JIANG Ze-min'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theory. JIANG has made an explicit statement that the goal of economic system reform of China is to set up a social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basic connotation is that resources allo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market, which is under macro-control of socialism countri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n economic system includes insisting that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plays the dominant role while developing various economic factors, insisting that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should be done on diverse forms of distribution, and taking advantages of both plan and market when doing macro-control. The basic framework contains setting up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forming national unified opening market system, improving macro-control system, developing an distribu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work, and building up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t multiple level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needs a long period and the task is arduous and complicat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real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account in order to combine market economy with basic system of socialism in a better way.

Key words: JIANG Ze-min;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theory;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opening-up

(上接第 75 页)

[8] 刘爱龙. 立法的伦理分析[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9] 高铭喧. 略论中国刑法中的死刑替代措施[J]. 河北

法学, 2008, 26(2): 18-21, 26.

[10] 谢青松. 刑法伦理学研究的意义、使命及其学科属性[J]. 云南社会科学, 2008, 28(4): 100-105.

Moral standards and realization approaches to good criminal law

XIE Qing-s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 good criminal law which is the common goal for legislators and legal researchers in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By analysis o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 history and through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present criminal law, this paper, with the help of history investigation and value analysis, proposes that moral value is the core standard of good laws. Good criminal law takes humanity as the bottom-line of moral idea, justice as the core, harmony as the highest moral idea. It also puts forward the realization approaches for good criminal law. As the ideal state of the criminal law, good criminal law will inevitably become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the criminal activity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good law; humanity; justice; harmony society